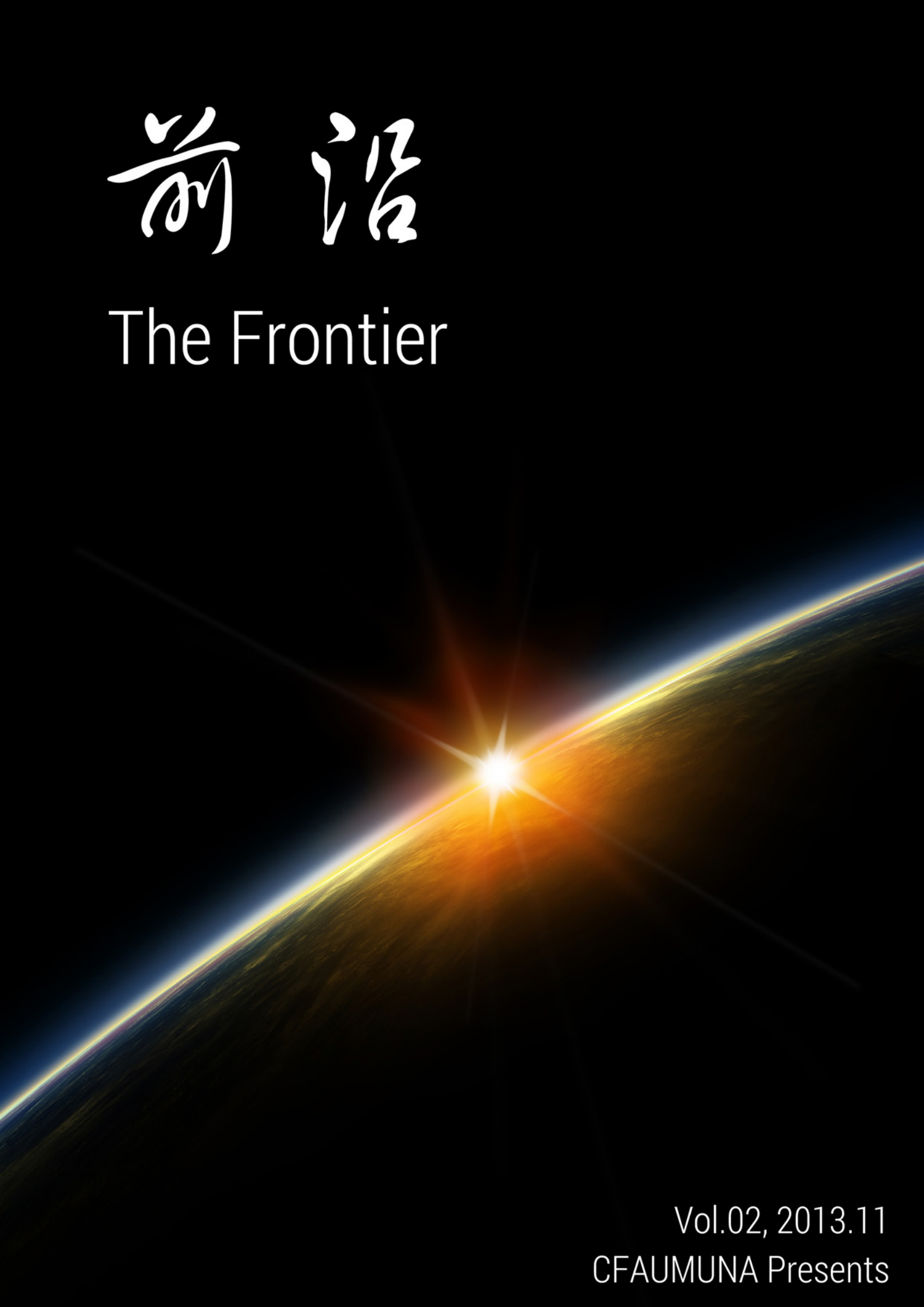
前沿

The Frontier



Vol.02, 2013.11
CFAUMUNA Presents

前沿

The Frontier

2013年11月下 总第02期
Vol. 02 November 2013

总主编: 黄启凡
副主编: 赵觉珵
周 楠
责任编辑: 杨程程
策划: 闵 悦
顾问: 黎毓珊
刘楚然

官方网站：http://i.cfaumun.org
特别感谢所有参加杂志投稿、制作的作者和编辑人员。

本刊为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内部刊物，立场中立，所有文章仅为作者态度，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投稿及一般性问题咨询，请联系 frontier@cfaumun.org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荣誉出品

卷首语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旅途中会有不同的际遇，时而跌落谷底山穷水尽，时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们顺时针向前走着，时间带我们认识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有的人选择俯首听命，左顾右盼。而有的人选择把握机会，坚持自己的选择，不问过程的艰辛也不问结果的好坏，只为求得自我审视时的不愧于心。而我们，要做的也是正在做的便是抓住机遇，勇敢而坚定地迈出第一步，让更多人听到我们外交学院模联人的声音。

对我们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并肩负着青年人的使命。1995 年，外交学院组织了国内首次大学生模拟联合国活动，将模联活动引入中国高校。2001 年，外交学院的精英学子们正式成立了模拟联合国协会，在一代又一代模联人的不断努力下将协会打造成了外交学院的“黄埔军校”。协会自 2002 年起，成功举办了 12 届全国规模的“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大会以高规格与高学术水平成为全国最知名的模拟联合国大会之一。外交学院是“外交官的摇篮”，而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是外交学院的“黄埔军校”。我们有责任将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奋斗精神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广大。我们也有义务将我们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让大家成为这个时代的青年领袖，引领青年风尚。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发表《前沿》刊物的目的很简单：一群热爱模联的人，愿分享作为模联人所学的点点滴滴，为更多的青年了解并参与到模联事业中来发挥一点光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不求《前沿》成为模联界流行开来的刊物，只要有大家看了《前沿》的文章觉得有价值，能引发大家对于模联这项活动的思考，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意义。

当一群有梦想和干劲的年轻人凑到一块儿，淳朴的理想也迸发出奇异的光彩。我们肩负着时代的重任，在不断学习的同时要将所学所得与其他青年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我们想要更多的人加入到模联的队伍中来，我们想要更多人听到模联人的声音。青年人应当有所担当，要有直抒胸臆的畅快情怀，为社会和世界的发展建言献策。无论我们的努力是否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只要我们坚定地奋斗，哪怕萌芽阶段浸透泪泉，撒遍血雨也无怨无悔。鲁迅曾说，“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我们现在走的正是一条未经开发的路，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不知道路途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既然选择了模联，就要尽全力将模联活动办好。这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幸运。如果前方没有挑战没有荆棘，我们也就不能深味奋斗的艰辛，又何谈深味收获的喜悦呢?

《前沿》是外院模联人的一份希望，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的一切的努力不是为了开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出惊艳的朵朵繁花，而是为了内心的那份责任，那份坚持，那份对于青春的无怨无悔。最好的时代在眼前，更好的年华在未来。

黎毓珊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会长
2013 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 秘书长

2013 年 11 月 18 日

目录

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林奕辰

1

Communis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Qifan Huang

7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李懿

10

Euro Crisis: A Silver Lining? Tianyou Gao

17

公共产品下的集体行动困境探析与思考 朱冠臻

21

从近现代日本对外学习的角度来看其对外交往 闵悦

25

Les conséquences des révélations d'Edward Snowden Qian Ge

29

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从《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看联合国的作用

林奕辰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成立并赖以运行的国际法依据，可以说是每一个模联人都需要认真研读的。如今，大部分的模联人没有读过《宪章》，而在读过的人中也很少有人会认真、仔细的读。笔者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安理会五常弃权没有一票否决的效果？有很多模联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回答说，因为弃权并没有表明反对；不要把国际关系想象得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迫于国际压力，不支持也不好直接反对，所以投弃权等等。但这样回答的人可以轻易推测出他们是没有阅读过《宪章》的。而要回答这类问题，必须回到宪章文本中去，找到法律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信口开河。

做模联，必然要学会看文件，甚至去学习文件。说国际法中最重要的文件是《联合国宪章》相信没人会反对。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到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过程充满着艰辛与坎坷。旧金山会议与会人员竟达 3500 人之多。宪章的每一个词的选择都经过仔细推敲。在宪章中，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因此，研究宪章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宪章赋予了联合国三大任务：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和普世人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和平。毕竟二战后同盟国建立联合国的初衷就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宪章的众多条款中，有一条可以称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mother clause。只要牵涉到有关和平，战争的相关国际法规，决议等，都要提到这个最重要的条款，宪章第 2(4) 条。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宪章第 2(4) 条的前身：《巴黎非战公约》 (Kellogg-Briand Pact, or Pact of Paris, 1928)。《巴黎非战公约》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却在国际关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人类第一次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和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的国际公约。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宪章第 2(4) 条。分析条款时，我们尝试把条款拆分成每个较小的词组，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1. Article 1 of the Kellogg-Briand Pact

Article 1

The parties ... condemn recourse to war for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es, and renounce it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1.1 Condemn recourse to war for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es

公约明确地禁止了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战争的出现，但同时也给国家留下了许多空间。首先，公约没有定义战争。多大规模算是战争？在边境相互发射炮弹算战争吗？其次，以武力相威胁是否也在禁止的范围内？这些都是公约没有规定的漏洞。

1.2 Renounce it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发动战争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国家政策，而国家政策的制定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因此，战争在国际社会上一直是合法的存在。从国际关系和战争实践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总结了许多限制战争的原则，例如为实现战争目的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一直以来是被约束的。但这种约束仅限于战争的行为规范，也就是 jus in bello (the limits to acceptable wartime conduct)。但战争的发动，是不受限制的。国家可以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制定与实施相应的国家政策。而公约限制了战争的发动，是一个进步。

但是，公约在此处有两个漏洞。其一，公约并没有提及国家自卫的权利 (Self-defence)。如果一个国家受到侵略，开展自卫战争，那是不是也不合法了呢？按照公约的精神，国家受到袭击时是否依然不能使用武力，只能付诸政治经济手段来解决纠纷？其二，公约将战争完全非法化了。公约忽略了人道主义干涉和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的手段。按照公约，卢旺达大屠杀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武力干涉，但往往此时武力干涉是最有效的。

1.3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巴黎非战公约》是一个多边国际公约，对签署国有法律约束力。这一段表明了公约只在签署国中禁止战争的出现。公约有 51 个签署国，也意味着在这 51 个国家之间发生的争端，根据公约，不能用战争来解决。但是，公约签署国与非公约签署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并没有被限制。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签署国，我就可以打你。

有了以上的背景知识，我们下面来探讨一下宪章第 2(4) 条。

2. Article 2(4)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4)

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1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从《非战公约》的 recourse to war 到 threat or use of force，我们看到字面上有两个明显的区别。第一个修改是增加了“threat”，不仅是战争被禁止，威胁发动战争也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第二个修改变动较大，从 war 变成了 use of force。这个麻烦就大了。

什么是 force？ economic force, political force, or armed force？宪章没有定义。有人认为这里的 force 就指的是 armed force。因为这一条继承了《巴黎非战公约》和《国际联盟盟约》的相关条款，而在以上两个国际条约中，均明确了国际社会禁止武力的态度。而此前也没有其他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禁止国家施加经济或政治压力。所以，force 当然就是指的武力，armed force。而且，宪章的序言只明确禁止武力的使用，而并没有提及其它因素：

... to ensure, by the acceptance of principle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ethods, that armed force shall not be used, save in the common interest...

所以，为了承接序言的精神，这里的 force 也应该指的是武力。宪章的中文版直接写的就是“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反对意见称这里的 force 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武力。经济封锁，政治干预，只要是任何有能力侵害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 force 都应该包括在内。要不然这一条就没有意义了。我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我们知道当一个条文表意不明或产生歧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法来确定它的含义：字面意思 (Literal meaning)，上下文 (Context)，和实践 (Subsequent actions)。从字面意思上看，force 虽然有武力的意思，但更常用的意思是 strength of power。单凭字面意思我们得不出结论。如果我们查找宪章相关的使用 force 的情况，我们发现在宪章的序言，第 41，43(1)，46 和 47(3) 条均使用了 armed force；而第 43(2) 和 44 条则使用了 force。既然宪章中反复地出现 armed force 和 force 两种用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宪章里，它们有着不一样的含义。

另外，在 1970 年联大第 2625 号决议中通过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宣言有数处都明确了国家不以军事，政治，经济或任何其它胁迫的方式来干涉他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责任：

Recalling the duty of States to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military, political, economic or any other form of coercion aimed against the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r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any State...

虽然宣言作为软法对国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宣言表明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观点。这种普遍观点认为国家不应以包括武力，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力量干涉他国。国际法院 1986 年在尼加拉瓜境内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 (Nicaragua v. US) 的判决中引用了友好关系宣言，认为宣言的内容构成国际惯例法。

The Court thus finds that ... the use of force incorporat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rrespond, in essentials, to those found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re exists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 opinio juris as to the binding character of such abstention. This opinio juris may be deduced from ... resolution 2625 (XXV) entitled "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ffect of consent to the text of such resolutions cannot be understood as merely that of a "reiteration or elucidation" of the treaty commitment undertaken in the Charter. On the contrary, it may be understood as an acceptance of the validity of the rule or set of rules declared by the resolution by themselves.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总结，在第二种解读当中，第 2(4) 条禁止了所有强迫 coerce 他国的手段，无论是军事，经济，政治还是其它任何的手段。有意思的是，在撰写宪章时，巴西代表团曾要求将 force 赋予更加明确的定义并将 economic coercion 写入宪章，但在随后的谈判中被拒绝了。

2.2 All Members shall ... of any state

与公约条款大不相同，宪章不单只是限制成员国之间不得如此，而要求成员国不能向任何国家，无论对象是否联合国成员国，threat or use of force。宪章将保护的对象扩大至所有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问题也出在这里。

State 没有具体定义。联合国有 193 个成员国。但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国家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数据。这里的 state 国际社会上大多数认为是事实国家 de facto state。那么，巴勒斯坦算是吗？台湾是吗？认为一个地区不是国家是否就能解除了宪章关于武力的限

定呢?

Failed state 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上越来越流行的说法。根据国际惯例法，state 要具备四大要素：1. Population; 2. Territory; 3.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4. The capacity to a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iled state 没有公认的定义。严格来说，这还不是一个规范用词。一般，我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失去领导力或执行力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 failed state，像索马里，海地。那么，failed state 还算 state 吗，还受到宪章的保护吗? 我认为是受保护的。即使国家缺少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但不妨碍还是一个国家的事实。一国也不能以别国政府不能正常工作为借口而干涉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同样，这也是我对人道主义干涉持反对态度的原因，除非是安理会为维护世界安全与和平，根据宪章第 7 章而做出的行动。

第 2(4) 条没有保护的是非国家行为体。国家面对反国家的暴动是可以采用强制手段的，除非反对派构成了一个 de facto state。但是，民族自决原则同样禁止国家采用强制手段剥夺人民自决的权利。不过这一原则出自友好关系宣言，而非第 2(4) 条。

2.3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这是最具有争议的部分。从语法上来解读，第 2(4) 条是一句话，against 引的后半句作为定语短语修饰前半句话。但取决于读者怎么理解 against 的修饰，第 2(4) 条可以解读成不一样的意思。第一种，将这个后半句的定语短语解读成强调 emphasize，强调 threat or use of force 是有害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是违背联合国宗旨的。这种是全面的解读。也就是说，除了宪章第 51 条提到的自卫权和第 7 章赋予安理会的维护集体安全的权利，宪章禁止一切其它的 threat or use of force。

第二种解读，将后半句理解成限制 limit。只有那些有害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违背联合国宗旨的威胁或使用武力是被禁止的。这种是限制性的解读 (Conditional)，宪章只禁止某一些 threat or use of force。那就是说，有一些 threat or use of force 是不有害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不违背联合国宗旨的，这些 threat or use of force 则被允许。例如，人道主义干涉的目的并不是要侵占他国的领土，也不是要破坏政治独立，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保护人权免遭迫害。这个目的也不与联合国宗旨向违背，所以是被允许的。

两种解读各执一词，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全面的解释。第 2(4) 条的存在就是为了限制国家使用强制力量。如果适用第二种限制的解释，那么定义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第 2(4) 条

的条件的自由裁量度就变得很大。如果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意解释第 2(4) 条，这明显有悖宪章的初衷。

有人批评，当今世界还是弱肉强食，冲突不断的世界。美国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使人们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在这种背景下，宪章第 2(4) 条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呢?

二战之后，和平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国与国之间越来越多地利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非暴力。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可以说是国际关系中的极少数案例。大多数的国家还是和平相处。虽然和平的实现有很多因素，但显然由于宪章的签署，非暴力非干涉渐渐成为了国际关系的惯例，这种惯例有效地维护了和平的状态。当和平遭到破坏，宪章第 2(4) 条被违反的时候，当事国大多时候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拒绝和抗议。这证明绝大多数国家还是认为宪章第 2(4) 条是国际关系的根本。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认为宪章第 2(4) 条已经失去效力。在国家实践中，当大国使用强制手段时，都会在法律上寻找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宪章第 2(4) 条。综上所述，这样不仅没有表明条款已经失效，反而证明了条款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 林奕辰曾经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高级成员。他于 2013 年从外交学院毕业，目前就读于伦敦国王学院，主修国际关系。

Communis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Qifan Huang

Though sharing the same name of “Communist Countries”, Russia and China do have a lot of differences. The Manchu China and the Russian Empire shared some crucial common factors in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ommunist regimes. However, several essential differences determine that the courses taken by these two countries towards communism are different. Furthermore,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st-war communist countries, headed into different destinations as communism was redefined in both countries.

Both China and Russia underwent a communist revolution: a peasants’ revolution led by people from below. They shared some essential similarities in their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China and Russia were alike in the fact that in both countries, the landed upper class by and large did not make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the world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did not destroy the prevailing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the peasants. The tendency for the peasant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to start a revolution, therefore, was high. Furthermore, in both Russia and China, the link between the landed aristocrats and the peasants was weak. In effect, the landed aristocrats failed to prevent or crush the peasants’ revolution. As a result, peasants’ revolution, led by leaders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in both countries, broke out. Furthermore, in both countries, the revolutions took the form of military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their own military forces, the Red Army, and the revolution gained eventual victory through some forms of a civil war.

However, despite these similarities, there ar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m. First of all, the two countries were different in the nature of the military strugg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the major enemy of the communists was the traditional party, the White, which aimed to resume the absolute monarchy and the traditional order.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ussia gained a comparatively quick military victory, as it was fighting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power, which had lost legitimacy for its unpopular war against Germany in WWI. As a result, Lenin’s “Peace, Bread and Land” gained a substantial

level of support from the peasant class, and the Russian Civil War was comparatively short. In China, however, the struggle was much longer and more complicated. Unlike the Russians, the Communists in China faced three major enemies, or the "Three Mountains": the traditional power, the foreign invaders and imperialists, and the domestic bourgeoisie (or, in Mao's words, "an anti-imperialism, anti-feudalism and anti-bureaucratic-capitalism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against these three enemies consisted of the three wars communists in China fought at the time: the military struggle against warlords, which remain somewhat traditional, the military struggle against foreign invaders, mainly Japan,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Kuomintang between the two Kuomintang-Communist coalitions after WWII. These military struggles had several distinct features from the Russian one. First of all, the struggle against Kuomintang was largely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As the Kuomintang played a major role in destroying the rul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 and had installed control over much part of China when the CCP was founded, and it had gained a substantial level of legitimacy and military power. Therefore, the military struggle against the Kuomintang was considerably harder, and the CCP was losing in the early period. Secondly, the Sino-Japanese War, or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the Chinese call it, became the crucial event for the CCP to eventually gain the power. Not only did the CCP gain material support from the Kuomintang and the Allies by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it also gained legitimacy for its contribution during the war. These features did not exist or were hardly relevant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or the bourgeoisie largely remained silent, and foreign intervention was absent before WWII and the Nazi Germany's invasion.

With these differences, the outcomes of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Russia wer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As an early mover and a front-runner among communist countries, the Soviet Union surpassed China in its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Furthermore, it became the ideological and military opponent of the West. Therefore, it was reluctant to start political or economic reforms, and unwilling to accept any form of assistance from the West, as the ideological burden was too high to overcome.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faced a different situation. China's economic weakness and its mass popul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quired its leaders to take a more pragmatic route to maintain its ruling. Furthermore, as China was ruled under communism for a substantially shorter period of time 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conomic reformation in China started earlier than in

Russia, Deng's reformation faced less ideological and realistic obstacles than that of Gorbachev. Also, as China remained in the middle ground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able and willing to accept material support and investment from the West. As a result, China had the advantage to start economic reformation early, succeeded substantially in improv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ts people, thoroughly abandoned the strictures of communist ideology, and regained political stability. Deng's reform helped China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play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economy wise; that of Gorbachev, on the other hand, destroyed a superpower. However, the drastic change in politics in Russia made it a polyarchy, while the continuous communist ruling in China, with its economic strength, may prevent substantial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near future, as it legitimizes the communist ruling. For the time being, China remains an inclusive hegemony.

In both cases, the communist ideals have changed into other forms.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Russia eventually failed. Alth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remains a political party, its political ideal may never be carried out in modern Russia.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mains the ruling party of China, its Communist ideals have been replaced by pragmatism. The two major communist regim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by are walking towards different destinations.

**Qifan Huang is a ju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a director in the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and also serves as the Chief of Publicity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Youth League.*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李懿

摘要：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快速崛起与其成功的经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本文探讨了当今中国能从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中得到什么启示。文章先分析了对于两个时期的两个国家的不同背景，对于战后的日本，经济外交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的经济外交也正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军事外交、政治外交等其他外交手段共同相互作用。在经济外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方面，战后日本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就是成为经济强国，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摩擦等等。之后文章研究和讨论了从外交总体方针和思想和具体政策两方面得到的启示。根据三条战后日本的具体经济外交政策的分析，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各个国家开展多方位多方面的交流合作以加强联系和外交关系；与各个国家发展好关系，通过取得他们的支持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但不与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和地区搞特殊外交，逐渐以多边代替单边，以国际代替区域；面对某些国家的抵制，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广泛开展有益的经济外交活动，以实际行动消除质疑和偏见，同时本着求同存异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以坦诚和开明的态度与这些国家交流沟通。

关键词：战后日本 当今中国 经济外交 启示

引言：战后的日本伤痕累累，广岛、长崎在被原子弹轰炸后已经是废墟一片，城市严重摧毁，百万人流离失所，没有家园。战争带来的巨大人力、财力损失更是无法统计。战后初期，日本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中断，1946 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62%，工矿业生产下降 31%，农业生产下降了 80%。然而，仅仅 7 年后，日本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仅仅用了 25 年，日本经济就登上了“世界第二”的宝座。日本的战后崛起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很多学者都讲其成功归于经济外交手段的巧妙运用。而中国经济外交，历经新中国成立 6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变化，目前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和研究，从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吸取经验教训，获得启示。

正文

一、战后日本和当今中国的背景差别

在学习别国的政策时，不能照葫芦画瓢，把别人的东西一模一样的拿来生搬硬套，更不能囫囵吞枣，不去抓住问题解决方法的本质，还没弄清道理就急着用。因此，在研究和学习

之前，我们需要比较战后日本和当今中国的背景差别，清楚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当今的形势。下面，让我们从两方面进行比较：

(一) 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战后的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整体外交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从广义的定义看，战后日本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有经济外交的特征。这与日本的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外交决策有关。日本战败后，一方面，国际社会反对日本重开军事外交的态度很长时间没有改变，日本国内也在新宪法中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1]，再加上世界大战后深入人心的拥护和平的思想，日本不可能重蹈覆辙，依赖于军事外交。另一方面，战败国的身份显然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使其既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抵制和歧视，又难得深受其害的东亚国家的信任，政治外交效果微乎其微。这两个条件，再加上日本以经济发展为立国之本的国家战略，使经济外交成为其主要外交手段。

对于中国，经济外交历经新中国成立 6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变化，目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经济外交有了更大的作用范围和空间。而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也要求中国的经济外交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部对外经济交流办公室主任邹加怡曾在采访中表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关系的基础，经济外交在我国整体外交中发挥着基石作用。可见，经济外交在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整体外交中与军事外交、政治外交等其他外交手段共同相互作用，达到外交目的。

(二) 经济外交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了解了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的地位后，我们还需要通过比较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全新阶段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目的性的研究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积极调整战略并采取更加有效对策。

战后日本初期，国家满目疮痍，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恢复国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同时，为了实现政治强国和军事强国的目标，日本将成为经济强国作为国家发展的初期战略计划。可见，战后日本经济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自国家内部，其短期根本目标，除了修复国际形象，最主要的仍就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挑战来自国外，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1 金熙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

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增加，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润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稳定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程带来的诸多问题要求全世界国家合作解决。因此，中国必须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一起，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努力，应对一系列问题：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抑制新保护主义、改革国际经济组织、优化国际经济规则、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恢复和发展，引导经济全球化步入正确轨道等，营造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1]

第二，09 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陷入经济衰退，虽然 3 年过后大多数专家称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世界贸易萎缩、国际投资剧烈波动、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能源资源价格大幅攀升的严峻形势仍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忽视。为了避免或减轻未来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造成过大冲击，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外交为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营造必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2] 09 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就通过实施“一揽子”刺激性政策避免了经济增长快速下滑，在其他国家经济负增长时实现了 8.7% 的 GDP 增长。未来的国际形势谁也无法预计，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维持自身的稳定发展。

第三，对外贸易摩擦等问题繁多复杂，如面向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质疑，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诉讼，人民币汇率升值，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等。根据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0 年，中国已经连续 16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 5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最多的国家。其中仅在 2010 年一年，中国共遭遇贸易救济调查 66 起，涉案金额 71 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外交又一艰巨任务。

二、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启示

了解战后日本和当今中国的背景差别，明确不同背景下经济外交的不同地位和不同目标后，我们可以开始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研究、学习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我先后分析了其总体方针和思想，探讨几个具体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思考他们如何帮助我们提出应对自身问题的解决方法。

需要提出的是，我没有具体分析日本的赔偿外交。赔偿外交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为了与遭其侵略的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开展赔偿战争损失交涉的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3] 战败后，日本背负着数额不小的战争赔偿，但却反而巧妙地运用赔偿外交，改善

1 江瑞平《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 年 05 期
2 江瑞平《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 年 05 期
3 田野《论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赔偿外交的价值取向》《学术交流》2010 年 3 月第 3 期

了国家形象，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推动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是一个公认的关于经济外交的成功范例。但是，我认为，赔偿外交有其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条件，与当今中国的联系非常小，我曾想到也许中国外债问题与之有关，但深入研究后发现他们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所以我的分析和思考中没有包含赔偿外交。

(一) 总体方针和思想

1. 明确外交方针，始终坚持既定方针

如引言所说，战后日本伤痕累累，问题重重，使得外交面临的挑战迫切而艰巨。之后的五十年里, 日本始终明确并坚持着各阶段的外交方针。战后初期, 日本当务之急是恢复外交权, 重返国际社会，奉行“追随外交”；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岸信介政府提出“经济外交”口号，几乎所有外交政策与经济外交有关，弥补当时军事外交和政治外交的微弱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奉行“多变自主外交”。日本的外交方针和战略一直十分清晰，就是恢复现状，成为经济强国，再成为军事、政治大国。虽然过程中不断有错误和挑战，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难以忽视。中国的外交也一直有自己的方针。建国初期，毛主席提出三点基本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1953 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的几十年中，又有不少方针的提出和实现，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着这些方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些方针大多提出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缺乏时代性，无法反应当今的新形势。21 世纪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大多数问题都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我们的外交方针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反应中国的未来目标，和日本一样，充分考虑到现在的自身国情和国际形势，有阶段性的调整，一步步解决问题，一步步发展，向最终目标和总方针努力。

2. 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因国而异

在制定外交方针时，日本基本准确判断了国际形势和自身条件，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对于东南亚，在吉田内阁执政时期，日本就十分重视这片地区。对于战后的日本，东南亚有巨大的商品需求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市场，与东南亚各国处理好关系能增加日本的政治资本，借此增强对西方国家的发言分量；对于美国，日美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关系的基轴和重点。对美的经济外交很大影响了日本的战后发展，具体的经验和教训我会在政策分析中详细再说；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日本必须忍受他们开始的抵制和不屑，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活动，试图争取平等的话语权。按其对象及作用，日本的经济外交可分为 3 种类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通商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外交，对特定国家的战略性

援助（或制裁）外交。[1]

对于中国来说，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不小的挑战。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系更加复杂密切，全球化将不同利益和背景的国家置于相同的问题和挑战下，世界格局的复杂化和国际环境的持续动荡使形势分析时刻处于变动之中，中国必须及时准确的作出判断。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应该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种：东南亚及周边地区，非洲等落后国家，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不同的经济外交对象和不同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只有采用不同的合适的外交政策，灵活运用，才能将经济外交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二) 具体外交政策

1. 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活动

战后，日本一直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活动。1952 年，日本先后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到“布雷顿森林体制中”。1955 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64 年，东京第十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970 年，大阪举办了世博会。同时，日本一直积极申请加入联合国，谋求常任国席位。加入国际组织有效地加强了日本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帮助恢复日本的国际地位。而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更是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利润和正面影响，专家们将日本举办奥运会后的发展状况称为“东京奥林匹克景气”。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活动的意义更不言而喻。中国也及时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1 世纪，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并与日本同样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在未来，中国应该扮演好在国际组织的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不同国家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以加强联系和外交关系。

2. 对美国的经济外交

战后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对美外交，将其作为整体外交的总方针。这一政策对日本发展影响巨大，可以说，战后日本是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与经济扶植，军事保护和政治提携下恢复和成长起来的，之后日本也一直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外交联系。不久前，日本是美国的“小弟”的调侃在中国还是很常见。从表面上，日本“依附”于强大美国的政策带来了不小的利益，如日本极为成功的赔偿外交就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但实际上，这个政策给日本之后的发展留下不少弊端和问题。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经历的经济危机，其直接原因是就是日

1 金熙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

元升值和基础货币增多。而日元升值很大程度上源于《广场协议》的签订，当时美国为了解决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使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的日本货币迅速升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在日本越来越独立于美国，会有与美国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那么日美外交关系能给中国怎样的启示呢？一方面，日本的许多政策因为有美国的支持才得以成功。中国想要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声音，获得更多话语权，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利用其他国家的优势解决一些国际问题。这些国家，不只是欧美发达国家，更包括东南亚及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国家，他们与中国的利益也息息相关，比如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合法地位时就多亏了非洲各国的支持。与各国搞好外交关系，取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单一注重和依赖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给日本带来不少问题，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应该与所有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不与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和地区搞特殊外交，逐渐以多边代替单边，以国际代替区域。这样中国能为自身发展创造更稳定的国际环境，不会因为与某个国家关系突然紧张而出现危机。

3. 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克服抵制

1952 年，日本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 (GATT)，遭到英、法、澳等国的坚决反对。三年后，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和依靠美国的支持，日本成为 GATT 的正式成员国。但是，英、法、澳、印度、巴西等 14 个 GATT 成员国宣布援引 GATT 第 35 条，与日本不适用 GATT 的关系。占 GATT 成员国近一半国家的如此做法，使日本的加入大为逊色 。[1] 之后 7 年，日本一直就这点致力于消除这些国家（主要是西欧国家）的抵制和偏见。现在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既害怕中国的极强竞争力，又质疑其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对中国存有抵制和偏见。

回过头看日本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第一，积极发展国内经济和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日本经济不断发展，让西欧各国看到与日本合作的利益，日本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减弱了他们原先的恐惧和怀疑态度。第二，积极与西欧国家交流、游说，从他们的立场帮助分析日本加入 GATT 可以带来的巨大利益。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提出“三大支柱”论，即“北美、西欧和与之并驾齐驱的日本作为自由阵营的三根支柱，应该创造巩固的合作体制”，并于 1962 年访问欧洲六国，进行游说谈判，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种种外交努力，最终促成了 1964 年英、法等绝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撤销对日援引 GATT 第 35 条，给日本以 GATT 缔约国的正常待遇。中国也应该从这两方面入手，既要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广泛开展有益的经济外交活动，以实际行动消除质疑和偏见，让其他国家认识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

1 周永生 《经济外交》青年出版社 2004 第 228 页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要积极与相关国家交流沟通，本着求同存异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以坦诚和开明的态度，分析现有问题的原因，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能给当今中国不少的启示。中国经济外交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处于一个全新的阶段，除了自身的探索和创新，更应该多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和教训，更好的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与机遇。

参考文献

1. 周永生 《经济外交》青年出版社 2004.
2. 金熙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日本学刊》1995 年第 04 期
3. 江瑞平《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 年 05 期
4. 田野《论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赔偿外交的价值取向》《学术交流》2010 年 3 月第 3 期
5. 徐建华《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目标选择过程中的美国因素》《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 年第 08 期

* 李懿是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的大三学生。她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总监，同时也是外交学院团委学生会学习部部长。

Euro Crisis: A Silver Lining?

Tianyou Gao

Back in 2008, when big financial agencies fell on Wall Street, desperate clerks at giant investment banks, hedge funds turned their last grasp of hope westward, hoping their counterpar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would soon come into rescue. Well, alas, this hope turned out to be the moon in the mirror, with their colleges in London Offices also deep tied up to their own quagmires.

Few would forecast the severity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late Euro Crisis before the debt crisis amounted to something beyond control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even some experts claimed otherwise. The current Euro Crisis, is an ongoing crisis that has been affecting the countries of the Eurozone since late 2009. It is a combined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banking crisis and a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crisis. Also, with regards to all the collateral damages this crisis has done to the euro zone economy, such as impeded trade, slow economic growth, inflation,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and above all, a faithless market, the investors, who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core in rejuvenating the euro zone economy, has been starting to pack up and leave this land in seeking for more profitable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for instance.

The late Euro Crisis made it difficult or even impossible for some countries in the euro area to repay or re-finance their government deb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ird parties. Moreover, banks in the Eurozone are undercapitalized and have faced liquidity problems. Additionally, economic growth is slow in the whole of the Eurozone and is unequally distributed across the member states.

If one simply takes a look at all the statistic figures released by respective nations, one might just as well be appalled by the damage this late crisis has done. From late 2009, fears of a sovereign debt crisis developed among investors as a result of the rising private and government debt levels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a wave of downgrading of government debt in some European states. Causes of the crisis varied by countries. In several countries, private debts arising from a property bubble were

transferred to sovereign debt as a result of banking system bailout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slowing economies post-bubble. The four economies that were hit the hardest, including Spain, Portugal, Greece and Ireland, failed to come with viable plans to recover or even ease off the crisis until recent years. In Greece, high public sector wage and pension commitments were connected to the debt increase. In Spa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hit a record high, with over thirty percent of the young population loitering on the street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save the Eurozone economy. The three leading powers,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all taken their respective measures. However, with domestic issues popping up from one another, people failed to see the consistency in policies and concrete approaches. In the meantime, lacking close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trust also shadowed the efforts in reaching into a consensus.

In dealing with the crisi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played a crucial role. Aside from all the political measures and bailout programs being implemented to combat the Eurozone crisi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has also done its part by lowering interest rates and providing cheap loans of more than one trillion Euro to maintain money flows between European bank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nounced this week how it will undertake a root-and-branch examination of banking assets before it takes charge of supervision in the euro area late next year. One aim of the exercise is to identify the bad debts that are fouling up euro-zone banks and preventing the flow of new credit.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parts of the single-currency area are crippled not just by public borrowing but by private debt, most of which is sitting on banking books.

The ECB's banking probe will cause some of this debt to be written down as banks are forced to recognize some of their bad loans. But the clean-up could be limited because of the fear among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solid finances that bad banking debts will be dumped into a common rescue fund. If the quality of these assets is not properly addressed this time, it will cast a long shadow over the euro zone's chances of making a sustained economic recovery.

**Tianyou Gao is a ju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a director in the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欧洲梦，欧元劫

高天游

自 2009 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经济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连年的经济衰退，如山的财政赤字都紧紧地扼住了欧元区渡过危机，复苏经济的咽喉。

然而好消息是有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欧元区不再面临生存危机，但最近的一波经济增长算不上复苏。欧元区仍然缺乏一个融合国家责任与共同团结的方案。2008 年美国的债务戏剧在欧洲引发了复杂的情绪。从理智上讲，人们担心美国违约可能将世界拉回衰退，可欧洲人回想起美国人对他们处理欧元危机的说教，又不免幸灾乐祸。然而美国人正走在通往经济复兴的道路上，可在欧洲这片金融业、银行业发源的沃土，复苏的曙光仍然是尚未完全地展现出来。

绝大多数的欧盟成员国已经认识到，欧元区已是欧洲一体化的真正核心，解决危机的思路应该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修订相关条约，目标是将欧盟改造为一个适于管理复杂货币联盟的组织。这种政治联盟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解决现有债务，为未来债务创建一种能让各国共同承担责任的工具，建立紧紧锚定于中央政治层面的银行业联盟，以及进行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

然而欧元区化解这场危机的方式——既不诉诸于债务减免、转移支付，也不诉诸于由各国共同承担的债务工具，而只是依靠财政调整——已经造就了一场通缩式债务危机，而且这场危机毫无结束的迹象。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强大中央决策权的政治联盟。然而，欧盟的机构是基于一种“社团主义思维”创建的，它们的任务是解决贸易冲突或竞争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问题。

如今，欧元面临的事关生死的威胁不再是大范围的金融投机、银行挤兑或极端主义党派的兴起，而是活力的丧失。根本原因在于欧元区对自身债务危机的应对方式：即在外围国家实行紧缩措施、下调实际薪资，但在北部国家却不做什么调整。

没有了单一货币，欧盟将变得死气沉沉，与 1998 年（欧元正式推出）时大相径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将走入死胡同。没有了单一货币，欧盟单一市场也将倒退。此外，鉴于等待入盟的国家只剩下那么多，欧盟扩大进程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留在欧盟或者退出欧盟，它多半都与欧元无关。

最近几周欧元区正在加速摆脱经济衰退。德国和势头稍逊的法国在 2013 年第二季度终于摆脱经济衰退，从而把欧元区拉出了“双底衰退”泥潭，这是因为德国和法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几乎占欧元区 GDP 的一半。此前，欧元区经历了连续六个季度的衰退。但是质疑仍然存在——这只是德国的单一复苏还是欧元区的全面复苏?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因为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而受到其他国家的羡慕。德国是欧洲大陆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财政预算也接近平衡。德国还是欧洲制造业大国，其经常账户盈余可与中国媲美。德国一直极大地受益于其在资本商品、豪华汽车以及化学品方面的历史优势，这些方面正好与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需求相匹配。但在 9 月举行联邦大选之前，德国制造业有丧失优势之虞。

尽管欧元区内部仍存在经济周期分化现象，但是一些外围国家，如葡萄牙和爱尔兰在第二季度重新走上经济正增长轨道。西班牙的先行指标与政府评估报告表明第三季度该国也将加入正增长行列，而意大利可能在年底恢复增长。即使是在深陷困境的希腊，目前政府预算也计入 2014 年经济（微弱）增长 0.6% 的预期。

此外，虽然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财政政策稍有放松，但是紧缩政策和结构改革仍未结束，而且还将继续抑制国内需求，因此财政政策显然不会主导经济复苏。出口不得不担此重任，但这对欧洲来说存在极大风险。目前的一些新兴市场，如中国，仍处于增长放缓阶段，所以欧元区向这些新兴市场大量出口并没有太多胜算。除了外部因素，我们还要考虑欧洲内部问题可能再次引发欧元危机。不管怎样，德国大选以及意大利政府危机之后，欧洲政治形势相对趋于平静。相比数月之前，现在欧洲经济已经不那么黯淡，考虑到过去五年欧洲一直阴云笼罩，这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政治就是选择。无法做出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在那种情况下，危机将继续，欧洲将步入噩梦般的场景：欧洲选民背弃欧洲。那将是欧盟和欧元的末日。

* 高天游是外交学院英语系的大三学生。他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总监。

公共产品下的集体行动困境探析与思考

——以气候变化谈判中构建的制度为例

朱冠臻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谈到，“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亚里斯多德的断言放之今日未免武断，放眼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全球共治”的概念正在兴起。然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各国未必会采取通力合作的方式，有关公共问题和集体事务的集体行动往往面临着困境。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人类共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人类所消耗的公共产品，同时也需要人类的共同维持和保护。随着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各国日益认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愿意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走到一起，开展相关的会议。然而，在气候变化的会议中，却出现了曼瑟尔·奥尔森所著《集体行动的逻辑》描述的情况，即在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中，往往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会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是有害的结果。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美国反对并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在《京都议定书》议题上一度犹豫不决。一些国家政府在协调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环境收益之间面临两难境地，都希望根据本国利益，最大程度的减少负担或者免费“搭车”，享受其他国家通过牺牲碳排放额而得来的环境收益，而本国得以继续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

这些在全球事务中面临的困境并非罕见，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探讨，将每一个国家置于国际社会中作为个体来看待，而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将国际社会作为集体来看。与此同时，假设每一个国家都遵循理性的原则，那么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角度，我们或许能探知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理性分析的框架下，各行为体追求个体理性而忽略集体利益，是集体行动面临的最大困境。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强调了公共产品问题中普遍出现的“搭便车”的问题。一般而言，是指某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经济学原理上称之为“正外部性”。“搭便车”作为公共产品的衍生物出现本身无可质疑，但是公共产品的供

给出现问题时，会需要集团成员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如果集团中的每个行为体都自觉利用“正外部性”谋取自我利益，尽可能让其他个体而非自己做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则会造成集体的不作为，从而使得问题一拖再拖，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了“公共牧地积水”的例子：在一块公共牧地上，两个邻人共同享有公共牧场自由的放牧权利，同时负有管理牧场的义务。当公共牧地积水时，两人可能达成协议共同排去牧场的积水。但当公共牧地开放给一千人时，协议就很难达成，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坐享排水后的放牧权益，而并不承担原应承担的义务。从而使得牧场积水的问题悬而不决。

另一方面，加雷特·哈丁于 1968 年分析了集体行动下，各方采取满足自我最大利益的措施而导致集体利益受损的设想，即著名的“未受规范的公地悲剧”。同样是有限的公共牧地资源，一群牧民拥有一块公共牧场，每一个牧民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对个人而言，放牧的牲畜数就是他的直接收入来源。当过度放牧问题出现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所得的结果必然是羊群的数量越来越多，而牧场质量下降，最终导致牧场恶化而无法放牧。

休谟和哈丁所提出的设想都是针对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问题时，各行为体在集体行动中不作为及乱作为的情况，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两种设想是基于每个行为体都是理性和自利的基础上的，并且在集体行动中，每个行为体都是自愿为集体付出成本，从集体取得收益的。尽管自利的行为体之间存在共同的需求与利益，集体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在实质上取决于自身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在自愿供给的条件下，理性行为体只是力求分享收益而避免分担成本或减小成本，除非采取的行动预期利益大于成本，或者为强制措施所规定，否则不会以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为目的而采取行动。

那么，从国家层面来看，又该如何看待集体行动中的困境呢？由以上的分析，集体行动依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当每一个成员都以理性、自利为自我特性时，往往会导致集体行动出现相应的困境。虽然现实国际社会中，存在以平等交往、互惠信任的价值准则促使行动者约束机会主义动机，以利他的方式达成集体行动的情况，但毕竟这种价值准则的约束力难以估量，大多数的国家在全球事务的实践上依然以国家理性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接受国家行为体是理性、自利的假定。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出路有两个方面，既然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难以做出改变，那么解决困境就更多地依赖于制度的安排。既然国家行为的自利动机无法改造，通过制度设计来协调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集体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在实质上取决于自身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当制度所体现的集体利益不足以抵偿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所应支付的成本时，成员对该项制度将抱以否定的

态度。因此，制度的设计在全球性公共问题上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否能够通过除集体利益外的额外性收益促使成员参与制度加入集体行动。第二，是否存在强制性措施，令个体放弃“搭便车”心态，使得不履约成本大于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

当集体利益外的额外性收益大于参与成本时，制度的设计将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气候谈判中存在两大重要文件可被称为气候谈判的里程碑，其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气候谈判的总体框架。其二是《京都议定书》，是气候问题领域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法案。《京都议定书》生效后，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三大灵活机制确立（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给不同类型的国家带来不同的积极影响。除却环境质量改善的共同利益，三大机制还将为各国带来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利益。

排放贸易制度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相当的资金流入，从而推动它们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清洁发展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同时减轻发达国家减排履约的负担。联合履行允许发达国家之间，使原本相对减排成本较高的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其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三大灵活机制充分考虑到各国的利益和成本，并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上日趋重要。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肯定了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国家的作用，为其提供了非物质性的激励因素。保罗·哈利斯所著《全球变暖与东亚：气候变化的国内和国际政治》[1]曾指出，中国等排放大国由于对国际形象的看重，决定了它们在国际环境保护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保罗·哈利斯所谈及的对国际形象提升与国际荣誉，实质上属于除却集体利益外的额外性收益之一。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际声望是帮助一国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一国与他国的交往的过程，属于多次博弈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行为体极端自私而不负责任，因而在一次博弈中获取了较大的短期利益，但在之后的多次博弈过程当中，则会因他国的不合作乃至报复而牺牲更大的利益。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行为体表现了对合作的诚意，那么在之后的博弈中则更易得到他国的支持与理解。权衡利弊，积极参与环境合作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是得到世界各国充分肯定的，虽然国际荣誉不属于物质性的激励因素，依然会以非物质性的激励因素的身份驱使国家为国际社会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不履约成本大于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的制度设计同样将迫使成员国放弃”搭便车“的心态，要求成员国履行义务。

国际声望的下降亦可被视为除却环境恶化外，不履约的最重要的成本，并集中表现为国

1 Paul. G .Harris ed. *Global Warming and East Asia: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03)

际互动中形成的社会压力。《京都议定书》所出现的社会制裁，在于它对不同的国家加以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体将被被排斥。一些不愿承担国家责任的国家，承受着国际舞台中舆论和社会的压力。各国均有责任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中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温室气体排放，因而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减排的成本，这一点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因此，《京都议定书》将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置入附件一国家，并为其规定了第一承诺期的量化减排义务。退出《京都议定书》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利益，减少国家物质成本支出，但是会被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呼声所批评谴责。在这种考虑下，一些在履约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国家，最终作出了履约减排的选择。

日本在 2011 年年末的德班气候大会中表示，不会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之后迫于国际压力与先前的承诺，日本环境相细野豪志表示 , 日本会继续留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中 , 在国内仍有必要切实采取措施 , 在第一承诺期期前，请求国民配合节电节能，加紧引入可再生能源，努力达成减排目标。”遗憾的是，由于核电项目的负面影响等因素，日本最终未能在 2012 年底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指标。但在国际舆论下，日本依然愿意留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中，放弃“搭便车”的心态，参与到节能减排的集体行动之中。

总而言之，在各国都是理性与自利的，并被置于同一共同利益集体的前提下，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各国的利益和成本的衡量。在处理公共事务的同时，各国避免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就必须在制度方面处理好额外性收益的问题，并协调好各方。个体行为自主的情况下，制度的设计是否能够激励多国参与并有效运行，是处理公共事务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

参考资料:

1、Paul. G .Harris ed. Global Warming and East Asia: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03)
2、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 朱冠臻是外交学院英语系的大二学生。他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干事。

从近现代日本对外学习的角度来看其对外交往

闵悦

摘要：日本被称为世界上最会学习的国家，近现代以来，日本向国外学习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从一个封建制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然而，日本的对外学习存在很多的问题，有盲目媚外的倾向，这深刻影响到了其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性。

关键字：日本 学习借鉴 西方 鹿鸣馆外交 战后

一、日本政治经济现状

日本，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四周环海的群岛国家，资源匮乏，地域狭窄，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生理密度高达 3054 人 / 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二。而且作为太平洋环火山地震带上的国家，频繁的地震也给日本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困难。日本封建政体在这里统治了千年之久，每个人都严格地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虔诚地信仰尊重着天皇。但在 19 世纪中期明治维新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日本却从一个在封建气氛中沉睡了几千年的国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一。虽在二战期间遭受重大损失和创伤，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正如它在世界博览会上展示的太阳神塔一般又再次崭新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工业发展程度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均在世界前列，成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远不如其经济影响力，近十几年来，日本一直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但是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一直收到政治、军事等多方限制的日本“入常”的愿望一直无法达成，政治影响力的发展仍受局限，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不够响亮。日本一直试图突破这种局限，但总是无法成功，这和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亲密关系有莫大关联。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有三次不同的发展模式：脱亚入欧，脱欧入美，和重返亚洲。虽然目前日本正积极向第三种转变，但是日本整个国内社会和对外关系都严重受到前两种的影响。目前来说，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在多数国际问题上，日美都站在统一的战线上，保持高度的紧密性。虽然这种政策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也严重影响到了日本对外交往的独立性。日本这种在对外交往中过于依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根源恐怕要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大量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先进制度、技术和思想。所以本文将从近现代以来日本如何对外学习这一层面来分析日本的对外交往。

二、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对外学习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同中国一样，奉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只在少数口岸与外国有交往联系。1865 年的黑船事件，美国用炮舰打开了日本的大门。面对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关税自主权丧失等多种威胁，日本的资产阶级打着“富国强兵”的口号在 1868 年开始了一场浩大的改良运动——明治维新。在政治方面，废除了旧的幕府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经济方面，日本引进西方大量的科学技术，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方面，日本倡导像西方一样的民主开化，改革教育制度，并向外派遣大量的留学生。与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日本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可谓更加全面和深入。从派遣留学生一事就可以看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学习皮毛技术，思想上一受影响即被清政府召回[1]，而日本的《海外留学生规则》中提到，“使之通达欧美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制度、文学、学术技艺及其他百科。”[2] 日本政府几乎把向西方学习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大振皇基，求知识于世界。”[3] 日本向英国学习其先进技术，向美国学习国民教育的方法，向情况类似的德国学习其政体。[4] 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则是在二战之后，经历二战的日本，国内工业几乎停滞，国内一片萧条。但后几十年，在美国的帮助之下，经济又重新腾飞。在二战后，美国已经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当然知道此时更应该向谁看齐。日本承接了美国因朝鲜战争而需要的大量军事订单，在技术方面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并且日本快速地复制了美国企业模式，索尼、松下等一系列企业都是于此而发展壮大。日本以重化工业为核心，从欧美引进大量先进技术，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1968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一直是世界上善于学习的典范，哈弗教授埃兹拉·沃格尔甚至把日本称为世界学习的楷模 。[5] 所以说，日本的对外学习可谓是和日本每一时期的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也在其对外交往模式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三、对外学习在对外交往中的影响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大量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福泽谕吉描述到：“天下之人，心尽厌门阀旧套，恰恰正当其迷失方向时，西洋文明的元素日益蔓延国中，不知所止境，其速度比传染病传播病毒还要快，欲留之而不可留。”[6] 日本对西方近乎崇拜的态度也决定了日本的外交立场。日俄战争中与当时最强大的英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欧洲最强大的德

1 牛贯杰《原来李鸿章》
2 吴式颖、阎国华《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3 明治天皇《五条誓文》
4 金素瑞《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向西方学习探析》
5 埃兹拉·沃格尔《日本第一》
6 《福泽谕吉选集》

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也成了日本的“御上”。[1] 明治维新时期有一处非常有名的建筑——鹿鸣馆，整个建筑仿西式洋楼而建，有三个舞厅，休息室等。建成之后，鹿鸣馆几乎成了国内外社会名流以及其夫人小姐们的俱乐部，各种晚会，盛宴不断，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夫妇和外相井上馨夫妇都是鹿鸣馆的活跃分子。鹿鸣馆的修建是日本“笼络外交”、“媚外政策”[2] 的产物，日本想通过这种笼络来达到同与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日本为了向西方证明日本也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统治者积极地推行这种全盘欧化政策。从这一事件足以看出，这一时段的日本对外学习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其对外交往政策，日本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向西方学习，那么便失去了自己该有的民族尊严，这表现在外交关系上，便是一种卑躬屈膝般的迎合与奉承，最终还是无法达到其想要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相反的，让日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受到了更多的有意刁难。转而说到二战之后，二战后的日本，在国际政治中丧失了说话的权力，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日本一方面被动地接受着美国的改造，一方面主动地向美国“单独媾和”[3]，主动地向美国学习其成功的模式，日本决心将美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合作学习伙伴。此时，日本当权的亲英美的政治家们对美国的崇拜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日本总理大臣吉田茂说到：“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4] 日美基轴外交政策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在国际关系问题中，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全面依附于美国，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和追随美国而仇视中国等。这种追随和依附的外交观念在今天追求政治大国梦的日本也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日本外务省 1990 年的《外交蓝皮书》说到：“与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是我国为世界做贡献的前提，因此必须继续强化这一关系。”[5]

四、日本独特文化心理的影响

从黑船事件开始到今天，近代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到今天位居世界前列的资本主义大国，对外学习一直是日本不变的特色，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谦虚地向他国学习必然是好的，但是往往容易陷入“盲目媚外”“低人一等”的困境之中，这也必定使其对外交往都带上“不自主”“不独立”的色彩，需要依附他国来追求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理想。日本千年前向中国唐朝学习，进入全面汉化时期，可谓是对唐朝每一处文化都吸收接纳，中国讲究“仁义礼智信”，但是日本却唯独没有学“仁”这一点，这也是后来日本会发展以冷酷顺从而著称的武士道的一个原因。日本选择摈弃“仁”，是日本独特的岛国心态造成的。日本作为岛国，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长期依赖于进口，这使日本人普遍拥有一种危机

1 尚会鹏、徐晨阳《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2 李建全《明治维新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偏差》
3 梁云祥、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4 梁云祥、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5 （日）1990 年《外交蓝皮书》

意识，这种高度的危机感使他们对外学习的欲望更加强烈，也使他们更倾向于放低自己的位置而依附于强者。再者，千年的封建统治，高压的等级制度使日本人民身心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之下，他们往往善于去顺从听从比他们强的统治者，日本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发展状态之后，必定会产生一种崇拜的心理。于是，他们把西方看作强者，看作可以依附的外在力量，追随其而行动，这迎合、满足了他们长期的受压抑，受等级局限的心理状态。

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保证国家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当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和结盟因素与对外政策交错在一起时，更应该注意到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不耻”并不意味着卑躬屈膝，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是一门学问。

近代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各支力量彼消我涨，激烈的霸主竞争从未停止，各民族文化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大交流，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发扬的是一种“扬弃”的态度，不失自我，又博采众长。日本从近代以来的对外交往学习心态在其对外政策上有重要的影响，日本今天已认识到这一情况，如何更加独立自主的站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依然是日本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如何正确的运用大和民族善于学习的这一特点也是日本的当权者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牛贯杰 . 原来李鸿章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06.125-129
2．吴式颖、阎国华 . 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3．金素瑞 .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向西方学习探析 .《探求》.2010.(4)
4．埃兹拉・沃格尔 . 日本第一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5. 尚会鹏、徐晨阳 . 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 北京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6. 李建全 . 明治维新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偏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版》,1999.(11) 卷 (1) 期
7．梁云祥、应霄燕 . 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18-133 许晓光 . 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大力吸收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36) 卷 (2) 期

* 闵悦是外交学院英语系的大二学生。她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干事。

Les conséquences des révélations d'Edward Snowden

--un séisme planétaire

Qian Ge

L'ancien informaticien américain de la NSA : Edward Snowden , est actuellement le personnage central dans le monde entier,après qu'il avait dénoncé l'intrusion des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dans la vie privée.Au mois de juin 2013,il a révélé des documents secrets de PRISM---le programme d'écoute exercé par la NSA au Guardian et au Washington Post. Ces révélations ont attient une ampleur exceptionnelle car elle touche aux questions si sensibles des libertés publiques.Plusieurs pays concernés par cette affaire ont tous connu le séisme du nom de <<Snowden>>,qui a déjà causé de nombreux problèmes internationaux.Comment en est-on arrivés là?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Etat-Unis et ses pays alliés se refroidissent.Bien qu'étant proche avec les Américans dans l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l'Union Européenne,elle aussi,a été surveillée par la NSA.En pleine campagne électorale,la chancelière allemande Angela Merkel s'est vu surveiller et demande au Président Obama des explications .La France a demandé également des explications car leurs documents importants ont été facilement interceptés par les autorités américains.En Angleterre,le gouvernement a fait détruire les disques durs contenant les documents que Edward Snowden a donné au Guardian de crainte que ces disques aillent tomber encore dans les mains d'espions d'autres pays.D'après les denières nouvelles,Snowden demeure maintenant en Russie,il aurait envoyé une lettre à Merkel dans laquelle il a exprimé sa volonté de témoigner de l'intrusion de la NSA lors de l'accusation.Par conséquent,on prévoit qu'il y aura des négociations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Union Européene.

Or,les bombes diplomatiques allumées par Snowden ont causé plusieurs crises diplomatiques,surtout les E.U et des pays qui leur sont hostiles,comme le Venezuela et Cuba.Il est à noter que Barack Obama a annulé le tete-à-tete prevu au G20 de Saint-Petersbourg avec Vladimir Poutine,après que la Russie a eu accordé l'asile au fugitif le premier août.Ensuite,l'écho planétaire du Snowdengate s'est repercuté au Brésil et cela entraine la fureur des autorités brésiliennes et l'annulation de l'importante visite que le chef de l'Etat brésilen devait effectuer aux Etats-Unis en octobre.Sans aucun

doute,Il est difficile pour la Chine et la Russie de fermer les yeux sur cette affaire.Le système informatique de l'université de Hongkong ont été piratés par la NSA et des communications officielles et des documents cruciaux pouvent être lus .Cependant,ce qu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recherche la cause de cette fuite,les autorités reprochent tout d'abord l'intuision des espions chinois aux Etat-Unis et ils ont montré une attitude beaucoup plus amicale au Japon.Pour la Russie,qui elle a toujours un adversaire des Etat-Unis,cette fois-ci,elle pourrait bien profiter de cette opportunité précieuse pour faire de l'affaire Snowden son atout moral contre futurs conflits avec les Etat-Unis.

Il est certain que les Etat-Unis souffriront de graves conséquences dans le cad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la situantion s'aggravera sans doute,si Barack Obama ne donne pas d'explications convaincantes.Et pourtant,quelqus temps avant les révélations de Snowden,L'Etat-Unis et L'Union européene ont même eu des négociations en vue d'un traité de libre-échange,actuellement,tout est au ponit de mort.La crédibilité américaine a été réduite par cette affaire qui a dévoilé ses actions de l'hégémonie tandis que ce pays avait toujours prétendu que les droits de l'homme dominent ses intentions.

En un mot, on peut constater que le monde n'est pas aussi paisible sous la surveillance de l'espionnage.Ce séisme a tremblé toute la terre et on arriverait à une nouvelle situation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Justement,On va voir comment les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régleront les critiques venant de toutes parts.

斯诺登的披露，一场全球性的地震

葛茜

美国安全局前技术人员斯诺登如今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早前他披露了美国当局对于私生活信息的侵入，这些爆料使这件敏感的事件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范围。许多国家正经历这才名为“斯诺登”的地震，事情是怎么发展到如此地步，又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斯诺登就请假离开了美国。他在香港给英国的卫报以及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爆料了一部分美国安全局的窃听计划“棱镜”的一些机密文件，随后他前往了俄罗斯寻求庇护。这些披露使得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冷却了。即使欧盟以前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是跟随着美国人的，但是他们仍旧是监听的对象。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就被监听了，她和

法国总统奥朗德一样要求美国给出合理的解释。英国政府则是命令卫报的工作人员毁掉他们持有的斯诺登给的爆料，以免落入了其他间谍的手里。

据最新消息，斯诺登现在在俄罗斯，他向默克尔致信，表达了他有意向对于美国安全局的侵入事件作证。就此可见，将会有新的一轮协调在美国和欧盟间出现。

另外，斯诺登点燃的这些外交炸弹一起了许多外交危机。特别是在美国和与他们不友好的国家之间，如委内瑞拉和古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同意了向斯诺登提供为期一年的庇护，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宣布取消了 G20 圣彼得堡峰会间和普京的见面。“棱镜门”时间同样还影响到了巴西，巴西当局在获悉被监听后，当即取消了即将前往美国的国事访问。而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孑然的远离这摊泥沼。据斯诺登说，中国和香港政府间的官方机密文件一直被美国当局截取着。然而在中国向美国讨个说法之前，白宫就先发制人的责难中国的间谍的侵入。至于俄罗斯，他们会好好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就会吗？会不会就此把斯诺登变为他们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王牌呢？

很显然，美国将要在外交领域上承受许多严重的后果，并且如果奥巴马总统不给出说服力极强的解释，事态很有可能恶化。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些事情发生的不就之前，美国和欧盟正着手推动建立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所以这一切都随之化为了泡影。棱镜门揭露了美国的抱拳主义，美国的信誉因此严重受损，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声称着人权大于主权。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在棱镜门后已经不再那么的平静了。这场特殊的地震，震动了整个地球，并且开启了一个新的外交关系局面。那么，美国又将如何去善后呢？我们拭目以待。

* 葛茜是外交学院外语系的大二学生。她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干事。

Vol.02, 2013.11
CFAUMUNA Presents